导　言

加入 WTO 后的中国汽车产业走向如何，关心的群体很多，这里不仅有跨国公司觊觎中国市场份额的扩大，更有中国百姓翘首期盼物美价廉的国产车走人家庭。这不仅仅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和一个急迫的理论课题。

WTO 与中国汽车产业，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课题。研究这一课题，方法科学、角度客观、体系合理，三者缺一不可。鉴于这一课题涉及的层面庞杂，探讨的角度不一，加之定义的模糊不同，谋篇布局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在战略上对方法论的要求极为突出。本文在方法论的运用上，特别注意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叙述上注意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运用，强调让数字和事实所表明的趋势去解释问题；在学科上采用包括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多学科立体交叉，构筑成一个有效的研究框架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关注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平台问题，在理论上偏重于介绍，在对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有些片面。如何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探讨开放竞争前提下的中国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战略定位与系统思考的研究尚不多见。本课题就是要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有所贡献。本文的研究内容是：

在第一篇中，为全文进行了理论准备，从对四种全球化理论的评述开始，提出了全球化的研究原则和类型设计，总结了全球市场和全球金融的时代特点；在对跨国公司主宰全球经济的定性分析基础上，介绍了国家利益和大国利益的内涵；进而提出了中国人世方略——只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性战略，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在第二篇中，通过大篇幅的实证分析，认定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选择导向性的战略产业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在本篇中，创新内容较多,如提出了‘ 大规模产业 ’的概念,给出了汽车产业链的利润分布表，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给汽车产业进行宏观定位，这在国内都均属首创，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

在第三篇中，抛出了汽车产业的当代概念，给人们认识汽车产业一个新视角；并从汽车产业与相关产业及支撑体系的内在关联方面进行详尽的描述，给人们对汽车产业一个全景式认识；着重预测了 21 世纪的世界汽车产业走势，也对 600 万辆汽车俱乐部给予了说明，特

别介绍了日本丰田公司的 21 世纪战略。

第四篇是全篇的重中之重。其中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了国际比较，分车型分析了入世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有积极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图解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对应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基本目标和发展道路，并提出了中国汽车产业应深入研究的 21 世纪课题。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正确认识全球化和 WTO，对于打造产业结构升级平台，对于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重构，在有限的几年何护期内，把中国汽车产业做强做大，力争在世界汽车产业中有一席之地，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

第一篇 揭秘全球化

“全球化”成为世界上流行的话语已有 10 年了。这个现象还在继续，并且从物质上到观念上在深刻地影响着、改变着包括个人、民族、国家以及各种组织在内的社会能动者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用新的选择和挑战组成了让各方难于应付的困境。我们无法把握和预测全球化时代的前景，不仅因为这个时代中蕴藏着太多的中短期风险和不测，而且更因为上个时代留下的等级、压迫和不平等的遗产，依然在搅扰我们的身心与制度。媒体在无端鼓噪，头脑在单极发热，不论是简单的乐观还是绝望的悲观，都有置我们于万劫不复的可能。

在全球化时代中，务实的乐观和清醒的思考是我们辨别全球化进程的路向和定位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所必需的。我们有必要对全球化进行一番理论梳理，使人们对全球化有全景式的认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会有助于对 WTO 与中国产业一目了然。

1. 全球化的本质

1.1 全球化的理论述评

随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全球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显学”。目前的研究现状可谓是流派纷呈，现就主要学派，作一评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已成为各国的通用名词，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四大学派对全球化给予南辕北辙的解释。

一是‘新左派’全球化是夺取市场

第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 A·Callinicos 和 S·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新左派”认为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 中世纪主义的本质是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主权；其核心是表明国家主权是可以重叠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overlapping authority and multiple loyalties） 尤其是，目前的‘政治全球化”是企图恢复古代帝国系统，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一种文化和宗教（如罗马天主教）或一种政治制度（如中国的中央集权）来统治一大区域，甚至全球国家。“新左派”认为，自古代以来，世界历史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历史时期：

第一是发生在公元 500－1500 年期间的中世纪，可称第一次帝国时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它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为代表；

第二是发生在 1500－1800 年期间的反帝国时期，也称近代民族国家时代（Nation－State），它是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

第三是第二次帝国时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时代（1800－1945 年），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以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为特征；

第四是战后的 1945－1970 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de－coloniz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特征；

第五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1980 年至 21 世纪初）的第三次帝国时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美金融贸易组织（NAFTA）为代表，以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重新一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地缘经济（Geo－economy）为特征和趋势。

对此，“新左派”认为，当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孕育

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之后，帝国系统在欧洲开始瓦解，但自主之后的欧洲列强将这种帝国遗产移植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直至二战之后，亚非拉国家开始回归当初的独立国家形态。如今，20 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所不同的是，这次全球化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的自愿原则。如果当初是通过战争打破主权界线和领土观念的话，那么今日全球化则是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循环效应。另外，与 19 世纪的武力侵略、领土霸占不同的是，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领土。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丢弃市场比丢弃领土更为悲惨,因为丢掉领土(如中国丢了香港)仍然可以再夺回来，领土是看得见的实体存在，丢了市场，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目前的 Internet 就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 是市场帝国主义，IMF 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最后“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往往是统治(ruled)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governed）帝国的所有领地和番邦，他们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资源、组织体系和信息渠道去管理所拥有

的庞大疆土,也就是说它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政治全球化的趋势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传统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统治’它们的主权,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新帝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远甚于‘旧帝国’。

二是‘新自由派’信息共享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K·Ohmae 和 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

他们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尤其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21 世纪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赞同与否，人类的选择只能是接受、适应和参与。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政治理

念截然不同，但它们共同对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存在一致认识，即他们不仅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共同认为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de - nationalization）的趋势，传统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 - state）的权威和地位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传统的国家既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本国国民的跨国界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的传统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不自然、甚至不可能的经济实体’，经济全球化正通过建立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家体系，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在此没有国界的经济体系之下，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客观的世界市场正在比国家的力量更强大”，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形成一个超然于国家主权的社会经济组织，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并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体。

鉴于‘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对全球化现实的认同，两派也可共称为‘超全球化派’（the hyper - globalist thesis），他们共同认定国家主权将让位于经济全球化，但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而目前

所发生和发展的全球化则是‘资本控制劳动’前提下的国家权力弱化，这恰恰是新自由派所乐见的。

三是‘怀疑派’国家和区域依然有效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 P·Hirst 和 G·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神话”(myth).

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 20 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 19 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互动”(interaction)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

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所以，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

同时，“怀疑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认定的国家弱化和消亡谬论，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因为

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具体国家和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达到经济自由化的持续，不然将一事无成。政府绝不是国际化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例如，今日的国际化，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推动的双边经济体系和民族经济自由化的一大副产品。经济国际化并不可能导致国家和政府失去机动性(immobilization) ,因为资本的国际化‘ 不仅仅能限制政策的选择,也能扩大(政府政策)的选择 ”。

另外“ 怀疑派 ”认为,国际化并没有导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相反，它是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 排弱 ”效应。同时,他们根本否定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全球劳工的分工与合作，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因为从经济结构而言“ 怀疑派 ”认为 20 世纪的世界经济，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全世界文明分解成为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

这样,不仅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文化全球化更是一个“ 天方夜谭 ”,而这种一统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事的全球化‘神话’与‘狂想”,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一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并企图强加于别人的一批强权国家的口号。

四是‘转型学派”无法预测、超越左右

第四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 Anthony·Gidens, J·A·Scholtet 和 M·Castells。他们认为,身处 21 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目前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事务”(intermestic affairs)日益成为一种新的边疆,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对这一学派而言,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产生‘剧变”(shake - out)。

但另一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而绝不是如‘新马克思学派’和‘新自由派’所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谁都无法预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说,“转型学派”既不象“怀疑学派”那样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与威力,但也不象“超全球化学派”那样认定全球化必然导致传统国家的

消亡,而是尽量不对全球化作出价值判断 既不认同‘ 新马克思学派 ’的全盘否定,也不赞同新自由学派的全面肯定,而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其发生和发展充满自身的矛盾与各种合力的因素，尤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无法预知。

尽管“ 转型学派 ”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认全球化下的新主权不再是传统主权所具有的绝对性、排他性、不可分割和‘ 零和性 ”,而且认为‘‘ 国界 ’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日益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如 WTO、IMF）的挑战。例如，欧盟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混合体，其主权被分割为国际、国家和地方三大块,任何一方(尤其是国家权力）都难以独立处理发生在自己领土内的金融和生态等事务。所以全球化是促使主权、领土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转型，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唯一或主要的统治形式。这样，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他们认为理性、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侧重推动经济发展、协调集体行为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他们坚持认为，全球化不是促使国家消亡，而是促使国家和政府实行战略转型和重组，并导致政府的活动更积极、更重要。

尤其是，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Anthony·Gidens ,他

是轰动一时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和《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的作者，主张中间偏左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由此为‘转型学派’增加了理论厚度。而且学派争论的历史表明,谁越站在‘中间’的立场,谁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掌声，因为中间总是代表大多数。

总之,如果‘超全球化派’定义全球化是全人类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怀疑学派’定义全球化只是一次国际化和区域化的话,那么‘转型学派’则认为全球化是区域间关系和行为的重组，国家不会因此消亡，也不会因此强大，而是因此得到转型和重组。

1.2 全球化的研究原则

全球化概念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共同体产生影响。我认为，构成全球化‘时空维度’有四点: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同时，全球化的历史形态是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系统性比较分析的基础。

全球化的历史形态可以时空维度来分析说明：

(1)全球网络的广度

(2)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

(3)全球流动的速度

(4)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组织维度

(5)全球的基础设施

(6)全球网络和权力实施的制度化

(7)全球分层化的模式

(8)全球交往的主导方式

在评估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时，强调 4 种类型的影响可能对国家和共同体产生了直接（改变着它们的形式以及做法）或者间接（改变着背景以及国家与竞争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的影响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决策影响和制度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尽管它们能够影响国家运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分配影响和结构性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也应该分辨出全球化历史形态的其他重要特征。除了扩大了全球化形态的时空维度外，还有 4 种维度标明了全球化的组织轮廓，它们是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以及交往的方式。要勾画全球相互联系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必然涉及到基础设施的支持，它们推动或者承载着全球流动、网络和关系。没有这种基础设施的支持，网络就不能存在。基础设施可能是物质的、规范性或者象征性的。例如，在金融领域有世界性的银行结算信息系统，它由一个由共同规则、惯例以及程序组成的系统调控，通过自己独有的技术语言（其中成员可以通过这种语言来共同协作）来运作。

在任何领域中，基础设施都有可能推动或者限制全球相互联系的广度和强度，它传递着流动和联系。基础

设施影响着任何部门中的交往能力总水平以及全球相互联系的潜在总量。交往能力被理解为交往（即现有的技术能力）的潜在规模，主要但不是完全由技术能力和通信技术决定的。例如，中世纪世界体系的交往能力受到了沟通手段有限的制约，远远低于当代的交往能力。因为在当代卫星和互联网有利于即时或者是同步的全球沟通。因此，基础设施的变化对于全球交往能力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基础设施条件也有利于全球网络、流动和关系的制度化。制度化指的是交往模式的规范化，以及它们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复制。按照全球联系（贸易、联盟等）模式的制度化来考虑问题就是要认识到全球网络和关系规范化的方式以及它们在能动者行为中体现的方式。这些能动者包括国家、集体、家庭以及个人，其活动涉及到从文化到犯罪的所有社会领域。因此，制度化构成了全球化历史形态的一个更重要的维度。

全球化改变着权力的组织、分配以及实施。在这方面，不同历史时代的全球化可能与全球分层化的不同模式有关。在勾画全球化历史形态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分层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分层化既有社会维度，又有空间维度，它们分别是等级和不平衡。等级指的是控制、进入以及参与全球网络和基础设施的不对称 而不平衡指的是全球化过程对不同的民族、阶级、种

族团体以及性别的生活机会和福利产生了不对称影响。这些类别为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全球统治和控制关系提供了一种机制。

在全球化的每个历史时代，主导性的交往方式中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我们有可能粗略地区分出交往的主导类型——帝国的或武力的、合作的、竞争的、冲突的以及权力的主要工具，例如军事和经济工具。因此，在西方扩张的 19 世纪晚期，有理由相信帝国主义和军事权力是全球化的主导性方式和工具，而在 20 世纪晚期，经济工具、竞争与合作似乎强于军事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化应该定义为跨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扩展过程，并对地球另一区域的民众和社区，产生广泛、强烈和快速的影响。这里的区域是指具有类似文化、宗教、观念或经济特点的一批国家,如欧盟和东盟等。所以,全球化与民族化、国际化和区域化，是一个不同概念：民族化是指在限定的国界内所进行的社会交流过程，国际化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区域化则是指同类国家在限定区域内的交往，而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在不同地域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

为此，对全球化讨论应遵循四大原则：

一是定性研究原则，即争论各方需要界定全球化的定义,包括全球化与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和西化等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